

泛北部湾地区

秦汉时代的古族社会文明

谢崇安◎著



科学出版社



泛北部湾地区秦汉时代的 古族社会文明

谢崇安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立足于现当代的考古发现,运用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方法,较全面深入地揭示了泛北部湾地区秦汉时代的古族社会文明史。本书着重研究了在第一次东西方交通大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泛北部湾地区如何演变成为中国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中原文明的不断影响下,发展成为汉王朝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前沿。本书也同时揭示出许多鲜为人知的东亚南部民族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取得的成就,这些实证研究可充分证明,岭南古族社会文明既是中国伟大的秦汉文明的组成部分,而且在早期的世界体系中也占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本书研究旨在补传世文献之缺,补中国区域文明史和东南亚史研究之缺。其中重现的中国秦汉区域社会文明失落的一段辉煌,可大大深化今人对南疆古代民族社会的了解和认识,能够感悟古代世界是一个整体。

本书适合于从事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及对中国古代文化感兴趣的人员参考、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泛北部湾地区秦汉时代的古族社会文明 / 谢炎武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4.12
ISBN 978-7-03-042621-1

I. ①泛… II. ①谢… III. ①文化史—研究—广西—秦汉时代 IV. ①K29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7431号

责任编辑:雷 英 张文静/责任校对:钟 洋

责任印制:肖 兴/封面设计:美光设计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年12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4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5

字数:590 000

定价:15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何谓“泛北部湾地区”	(1)
二、为何要重建泛北部湾地区秦汉时代的社会文明史	(1)
三、重建泛北部湾地区秦汉社会文明史的价值和意义	(3)
四、揭示南疆区域文明形态的多样性	(4)
五、史料处理与方法、理论的借鉴	(7)
六、何谓“泛北部湾地区的秦汉古族社会文明”	(9)
七、研究历史的简要回顾	(10)
第二章 地区与居民	(19)
一、地理概况	(19)
二、民族、语言和种族特征	(26)
第三章 秦汉王朝统一岭南及其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历程	(32)
一、岭南先秦时期的酋邦方国与秦朝的征服	(32)
二、秦朝统治的建立与南越国的崛起	(43)
三、西汉王朝的重新统一	(46)
四、东汉王朝在泛北部湾地区的统治	(51)
第四章 泛北部湾地区秦汉时代的社会政治结构	(55)
一、酋邦制的演变	(55)
二、中央集权下的地方政治制度	(58)
第五章 族群的分布与族群关系	(68)
一、族群的分布	(68)
二、族群关系	(75)
第六章 基层文化的形成和演变	(82)
一、泛北部湾地区基层文化形成的时期	(82)
二、基层文化的演变	(87)
三、多族群文化的互动	(92)
四、族群文化的融合	(94)

第七章 铁器时代的开始·····	(101)
一、铁器与冶铁技术的输入·····	(101)
二、冶铁技术的应用及其对岭南社会发展的影响·····	(104)
第八章 泛北部湾地区农业的发展·····	(109)
一、早期的农业基础·····	(109)
二、秦汉之际农业发展的转机·····	(110)
三、两汉时期农业的进步·····	(113)
四、园圃业的兴盛·····	(117)
五、两汉时期的禽畜饲养业·····	(127)
六、捕捞业·····	(131)
第九章 城市的兴起·····	(135)
一、秦汉城址的发现·····	(135)
二、城市建设的成就·····	(151)
三、城市的基本状况与人口增长·····	(153)
第十章 手工业的发达·····	(159)
一、冶金业·····	(159)
二、纺织业·····	(164)
三、车船制造业·····	(173)
四、漆器制造业·····	(179)
五、制盐业·····	(182)
六、其他手工业·····	(183)
第十一章 商贸的繁荣·····	(198)
一、商贸城邑的形成·····	(198)
二、交易集市·····	(201)
三、货币经济的兴起·····	(204)
四、商品的主要种类·····	(205)
第十二章 社会生活·····	(211)
一、城市的生活资料与设施·····	(211)
二、城乡的社会生活·····	(212)
三、服饰文化·····	(240)
四、交通出行·····	(246)
五、饮食文化·····	(252)
六、官署与民居·····	(256)

第十三章 宗教与民俗	(263)
一、上古先民的原始宗教和宇宙观	(263)
二、佛教与道教的传入	(270)
三、宗教祭祀与民俗	(277)
第十四章 思想文化与时代精神	(288)
一、文教的兴起	(288)
二、秦汉时期的岭南文化	(292)
三、泛北部湾地区的民族民间文化	(303)
第十五章 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	(315)
一、早期的航海条件	(315)
二、早期交通的开拓	(317)
三、海上丝绸之路交通贸易的发展	(322)
四、东西洋交通航线的正式形成	(341)
第十六章 东西方文明的交汇及其历史作用 and 影响	(344)
一、东西方移民的进出	(344)
二、东西方文明的交汇	(352)
三、上古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作用和影响	(372)
第十七章 结束语	(381)
主要参考书目	(385)
后记	(392)

第一章 绪 论

一、何谓“泛北部湾地区”

何谓“泛北部湾地区”？本书所限定研究的空间范围，从狭义的空间来说，指的是今天中国的两广地区、南海岛屿地区，以及越南的北部地区，因为在历史上的秦汉时代，这些地区都先后被纳入秦汉王朝的版图。尤其是两汉时代，一般的越南历史书也习惯称之为“北属时期”。从广义的空间来说，“泛北部湾地区”又指与两广、南海岛屿地区和越南北部相邻近，且有密切联系的地区。因此，“泛北部湾地区秦汉古族社会文明史”的研究，事实上就是面向海洋的东南亚南部古族社会文明史的研究，涉及中国的南疆地区和今天东南亚的一部分地区。古往今来，这些背靠东亚大陆而面向海洋的民族，一直都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和经贸、文化交流。另外，此区域辽阔广大，地形复杂，它还包括许多内陆地区，有山地居民，也有平原居民，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也造成了族群及其文化的多样性。

二、为何要重建泛北部湾地区秦汉时代的社会文明史

中国古代文明的进程经历了数次社会发展的高峰，其中秦汉文明可谓是极为璀璨的星河之一，永远地辉映着中华民族浩瀚的历史时空。然而，楚河汉界虽为世人熟知，但银河繁星几许，却难道其尽。秦汉文明史研究领域也一样，虽经众多前辈学者的努力，研究成果也可谓汗牛充栋，但其中仍然存在着诸多空白或相当薄弱的环节。例如，迄今为止，我们也未能在坊间检索到一部自成体系的“泛北部湾地区秦汉古族社会文明史”。

秦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中央王朝极富开拓进取精神的时期。第一次从大范围的疆域上奠定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历史发展的基本格局。这一演进历程在汉语文献和考古发现上已得到充分的证明。然而，又由于古代历史文献的缺载亡佚，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边区的秦汉古族社会文明史片断又重新湮灭，造成了今天秦汉区域少数民族历史的缺失。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今天人们对秦汉文明史的许多内涵，对中国历史上许多辉煌的篇章，仍然是认知有限的、不完整的，尤其是边区秦汉古族社会文明史更有待于重建。

长期以来，历史上的所谓“华夷之别”和“华夏中心论”的种种偏见和误导，

致使中原人士对其岭南边区一直都存在着种种自相矛盾的看法，甚至极大地影响和限制着后人的视野。例如，宋代的范成大到广西为官，他在自著的《桂海虞衡志·序》中就说道：“始余自紫薇垣，出帅广右（今广西），姻亲故人张钦松江（今上海），皆以炎荒风土为戚。余取唐人诗考桂林之地，（杜）少陵谓之‘宜人’，（白）乐天谓之‘无瘴’，（韩）退之至以湘南江山，胜于骖鸾仙去。则宦游之适，宁有逾于此者乎！……乾道八年三月，既至郡，则风气清淑，果如所闻；而岩岫之奇绝，习俗之醇古，府治之雄胜，又有过所闻者。余既不鄙夷其民，而民亦矜予之拙而信其诚，相戒毋欺侮。岁比稔，幕府少文书，居二年，余心安焉。承诏徙镇全蜀，亟上疏固谢不能，留再阅月，辞勿获命，乃与桂民别。”

宋人多道听途说，秦汉时人则更是如此。人们对岭南边区始终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看法：一种是视边区为畏途；另一种是把岭南地区视为宝地。

诚然，自秦汉以来，岭南边区一直都是历朝著名的流放地，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就明载：秦朝所征发南下的内地中原人，除了征战的军队将士、辎重后勤人员等以外，还有大量的“罪人、赘婿、贾人、不直官吏、徙民”等。类似的记载不胜枚举。

与此相反的一面，中原人士又往往把岭南等边疆地区视为物产丰饶之地。例如，《史记·货殖列传》曰：“……九疑、苍梧以南至儋耳者，与江南大同俗，而杨越多焉。番禺（今广州）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太史公没有到过岭南，但据传闻，他已将南越的中心都邑番禺描绘成如同中原巴蜀成都之类的大都市了。

又《汉书·西域传》：“赞曰：孝武之世……士马强盛，故能睹犀布、玳瑁则建珠崖七（部）[郡]，感枸酱、竹杖则开牂柯、越雋……自是之后，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宫……鉅象、狮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

秦汉王朝开疆拓土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了获取边区的珍稀物等巨大财富，由是一目了然。可见，秦汉之泛北部湾地区并非真正的蛮荒之地，只因辽远的山川阻隔，其往往成为被中原人遗忘的明珠。之所以会造成中原人对南部边区的不识和误解，除了偏见外，还有一个缘故，那就是中国传统士人始终缺乏不畏艰险、勇于实践调查的科学理性精神。司马迁撰述《史记》，除了征引大量的史料文献，他也作过不少实地调查和访问，惜其未能亲至岭南。司马迁为后人写下的《南越列传》《西南夷列传》今天已成为珍贵而简略的南疆民族志，但这毕竟是凤毛麟角，吉光片羽尚不足以构筑边区古代文明史的大厦。

古人不识自我，情有可原，今天的我们要“认清楚过往的来程”却是为了要“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我们能揭示那些连古代中原士人也不甚了解的失落文明，能进一步领悟我们民族自身的存在价值和发展的意义，这才是我们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不断走向成熟的标志。这种追求真理的成熟是必要和必需的。值得庆幸的是，生活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能看到现当代科学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在广大边区的蓬勃开展，地下

文化遗存的发现层出不穷，它已能为我们重建边区的古族社会文明史提供可靠的前提和基础。如今，我们立足于考古发现，综合历史文献、民族志和人类学等学科的知识、方法和成果，已经有可能复原出泛北部湾地区的秦汉古族社会文明史。

三、重建泛北部湾地区秦汉社会文明史的价值和意义

如果我们将泛北部湾地区秦汉古族社会文明置于中国秦汉文明史的大背景下进行审视，则可知其价值和地位不可或缺，其历史作用和影响也可谓是巨大而深远的。

苏秉琦先生曾认为，中国早期文明的历程，一般是经历了由古国、方国到帝国的发展三部曲，秦汉帝国即处于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的高峰阶段^①。而支撑秦汉帝国大厦的经济基础，则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形成和确立在中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最后的确立是在秦汉时期。“使黔首自实田”（《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徐广曰），刺激了土地所有者及自耕农向两极分化方向发展，中国的封建社会从此进入新的强盛—衰败—强盛和兼并融合—分裂割据—兼并融合的社会循环。能够持续这2000多年的循环，根本动力在于封建土地所有制这一基本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应当说，没有强大的封建经济基础，秦汉王朝就没有实力保境安民和开疆拓土，也无法巩固其新领土的长治久安和促进当地族群社会的进步发展。因此，我们复原和重建泛北部湾地区失落的秦汉古族社会文明史，不仅能丰富中国的秦汉文明史体系乃至东亚南部的民族史内涵，而且也可以从中揭示和总结中央王朝开疆治边的成效及各种经验和教训。

中国古代王朝开疆治边的睿智者，推行中原的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的政策，往往都是因地因时制宜、循序渐进、惯用恩威并重两手的，这在泛北部湾地区秦汉古族社会文明史进程中都有明确的史实反映。因此，研究这一历史进程的同一性和特殊性，对于揭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多种规律也有着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and 意义。

例如，林剑鸣诸先生曾指出，秦汉王朝之所以能在中国历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其一是它最后在全国确立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其二是确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其三是融合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其四是实现了思想文化的真正统一^②。这些看法笔者是认同的。然而具体到审视边区多民族社会发展的实际，这些理论概括就存在需要完善补充的余地。譬如，秦朝强制推行暴政，统一中国后不到20年帝国就崩溃了。汉王朝吸取秦亡的教训，虽说是汉承秦制，但实能因地因时对秦制有所损益，其中最有效的就是承袭了秦朝原有的中央集权制下的羁縻制。这就保证了西汉王朝新开辟的南疆地区的人民能获得休养生息，并持续了数个世纪的发展与繁荣。

①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② 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3～11页。

事实上,汉王朝在其南疆地区建立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也是相对该地区的中心地带而言的,因地域辽阔,地理生态环境复杂,统治力量鞭长莫及,地方政府只能依靠土酋代理统治当地的少数民族。在岭南等多民族地区的社会和谐发展中,来自内地中原的汉移民则充当了民族融合的主导力量,一方面是来自内地中原的汉族地方官在中心大邑地区逐步推行汉化,另一方面是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得以自主地存在和发展,并不断推演多民族文化的互动与融合。可以说,这种多民族共生的政体、文化和经济模式,与内地中原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自秦汉以来,可说是一直延续到很晚的历史时期。郡县制与羁縻制并存下的泛北部湾地区的秦汉社会结构是多元化和多层次的,它能延续漫长的时期,不能不说这也是一种古代政治文明的体现。

没有交流就没有社会的繁荣和发展。秦汉时期的中国王朝文明声名远播,到了西汉中期以后,东西方世界进入了一个经贸文化交流大发展的时代,当时中国与西方交通主要分南、北两途,除了北方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交通线就是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自汉武帝重新统一岭南并设置郡县以来,这些面向海洋的南疆中心都邑也成为两汉王朝对外交通的重要门户。例如,当时以今天越南河内地区为中心的汉朝交趾郡,其人口户数已超过南海、苍梧等郡,因东西方海上交通贸易的频繁,汉之交趾、日南诸郡成为了当时最具有国际化色彩的南疆港口都邑。虽然从历史文献观察已难窥当时的盛况,但重新梳理诠释迄今出土的成千上万的考古遗迹和遗物,我们即可触摸到近2000年前那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我们将以充分的实物史料去阐明,泛北部湾地区的秦汉古族社会文明是中国秦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无可替代的历史、科学和艺术的多重价值。可以说,重建过去,用狭义历史学方法无法复原的南疆上古民族文明史体系,就是本书所要采取综合研究方法去努力追求完成的学术目标和任务,这也就是该研究的价值和意义之所在。

四、揭示南疆区域文明形态的多样性

泛北部湾地区的古族社会文明,虽说是东亚大陆古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与中原文明形态却有着较多的不同;作为区域性文明,它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可以说,本区域的社会文明发展具有显著的不平衡性,这一点西汉的司马迁就有明确的认识。《史记·货殖列传》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执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皆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太史公据当时传言,从地理生态环境和生存形式的角度区分了中原与百越地区社会经济差异,其载言有符合事实的一面,但也有失之偏颇的一面。

事实上,古往今来,广大的南疆地区民族因地制宜,在不同的生态环境中,他们都先后创造了适合于本地民族生存发展延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日本学者曾从文明生态观出发,归纳出本区域自古以来主要有四种人类生存方式。一是“烧田和水稻耕作形式”,它主要见于内陆的广大山地。在这些山地斜坡上错落分布的许多游移的小聚落都是以烧田为生活方式的民族,他们种植旱稻。这种东亚南部早期农耕生活的原型之一,近现代仍不稀见。据日本学者统计,1980年以前,华南与东南亚仍然有108个烧田耕作的民族(图一)^①。人们往往认为,刀耕火种是一种落后的生产方式,但据现代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和研究,它却是游耕民族为了适应生存,因地制宜的生态耕作法。烧田耕作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抛荒轮作,产量不高,但它能满足多种经营的山居民族的需要,且地力和植被因此得到了恢复,结果是人与自然的互动实现了良性的循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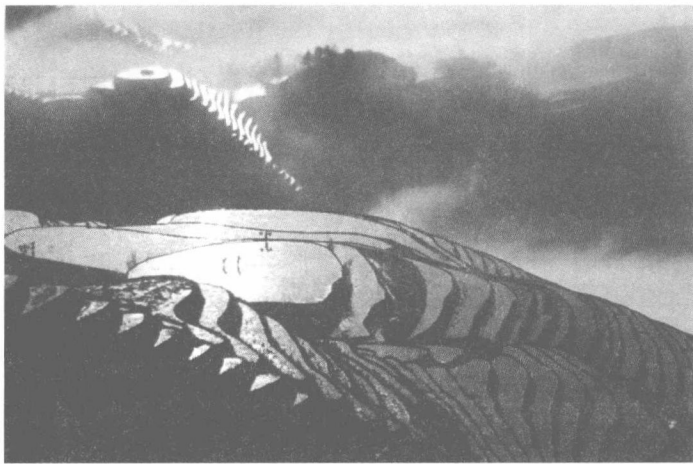
图一 越南北部山地泰人的烧田耕作

与此同时,这种高地在水源充足的前提下,也会产生许多水稻梯田,这以广西北部山地龙胜等地壮、侗、瑶诸民族的梯田最为著名(图二)。然而,以烧田或梯田耕作为特点的族群社会只能是处于典型文明社会的边缘化地位。

在东亚南部的崇山峻岭河谷之间,还散布着许多大小不一的盆地,这里就是具有水利灌溉设施的水稻民族聚落区,它以壮泰语族为代表。这种山间与盆地相连的地带,在先秦时代已孕育发展形成了若干个相对独立的青铜文明的中心,如中国云南昆明盆地的滇国,就产生在这样环境。

二是平原稻作农业区。东亚南部山地丘陵之下还会形成不少的河流冲积平原,这里开垦容易,运输便利,可大量种植稻米,在先秦时期也形成了若干个古代文明的中心邑聚。广西东部的西瓯国、越南北部的骆越国等一些聚落群中心,就属于这样的古代酋邦方国。

^① [日]大林太良等:《东南亚·大洋洲各民族文化的数据库制作与分析》,《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报告·别册》,日文版,1990年,11、40页。



图二 广西龙胜金坑梯田^①

三是大河三角洲稻作农业区。由支流汇集的大河流穿越平原流往东面的海洋，就是河流三角洲地区。这些河流是从中国西藏、云南流向东亚南部平原的大河，热量充足，使之成为稻米产量最高的地区。这一地区是内陆与盆地酋邦、方国文明的延伸地。因此，以中国岭南番禺（今广州）为中心的南越国、以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为中心的安阳王国就产生在这些地区。

四是沿海渔业捕捞区。泛北部湾地区面向海洋，海洋供给了当地人食盐和大量的海产品。同时，海洋也是重要的交通线，岛屿之间、岛屿与内陆之间，都离不开海洋与内河相连的水路交通线，这里也是古代东西方人民交通的必经之路。海洋也是沿海地区人民的生活场所，它为海上船民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和丰富的物质资源。这一地区在秦汉时代，更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前沿。

总之，本区域并不是纯粹的地理单元，而是由多个地理单元组成，由于受地貌和大气环流的影响，其地貌特征和自然景观是有层次分布的，且呈现出复杂多样性，因此，古代文明只能是分别产生于适宜的地区中心，这种文明社会的发展演变在整个区域内肯定是不平衡的，依靠其内在若干个文明中心的互动，也很难形成像中原内地那样的统一帝国。

可见，我们要揭示的泛北部湾地区的秦汉文明及其族群社会，其内在的运动规律与外部文明的作用力是紧密相关的，与中原秦汉文明研究有所不同，我们要着重揭示的是各种小生态下产生的酋邦方国文明与中原国家文明的互动与融合发展演变的历程。

^① 采自《广西民族工作》2011年第7期，34页图版。

五、史料处理与方法、理论的借鉴

要完成本课题的研究,先决条件是对史料的占有。我们的史料来源主要有三个部分:一是传世的古代文献;二是地下出土的考古文化遗存;三是民族志和人类学资料。

严格说来,有关泛北部湾地区秦汉时代的直接史料记载是不多的,它们在《史记》《两汉书》等传世古籍中所占的比例极小,而且也较为片面。在现代前辈学者的论著中,都曾对本区域有关的古文献史料作过较深入的梳理分析,代表性的有徐松石的《粤江流域人民史》^①、蒙文通的《越史丛考》、越南学者陶维英的《越南古代史》等。这些古文献研究至今仍然是我们作共时性和历时性比较研究的坚实基础。

与稀少的古文献相对而言,地下文化遗存的考古发现可说是层出不穷。墓葬和遗址,大都经过科学的发掘,地层关系清楚,时代明确,这都可为我们复原秦汉时期的岭南社会文明史提供极为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其中的代表作有《广州汉墓》《广州南越王墓》《合浦风门岭汉墓》《广西田野考古报告集》《广东文物考古三十年》等。

自法属殖民地时代以来到现当代,岭南与越南北部的青铜时代与铁器时代的遗迹发现也为数不少;国外学者也作过许多相关的比较研究。例如,日本学者吉开将人在作专题研究和考古实践的基础上,完成了《南越史的研究》(日本东京大学博士论文,2000年);俵宽司所作的《越南古代史的考古学研究》(日本九州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不仅利用了越南现有的汉墓资料,还利用了瑞典学者阳士在法属越南时期发掘的越南清化绍阳汉墓的资料;日本学者西村昌也所著《越南古代考古学》(东京,同成社,2011年)一书,是他在完成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吸收了越南、中国等国学者的成果,对越南的古代考古发现所作的较全面的综论和探索。可以说,通过比证古文献,我们已经可以利用考古文物资料阐明直观生动的区域秦汉古族文明史。

何谓民族志和人类学资料?广义的民族志和人类学资料,应当包括历代传世文献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史志材料,以及近现代民族学、人类学学者通过科学的田野调查和理论研究获得的民族史研究成果。

论述秦汉时代的直接文献史料虽然不多,但相关的历代地方文献史料还是不少。例如,南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三《外国门下》载:“西南海上,有昆仑层期国,连接大海岛……又海岛多野人,身如黑漆,拳发。诱以食而擒之,动以千万,卖为蕃奴。”我们将之比证汉代盛行蓄奴的文献记载,又参证岭南汉墓出土有黑人俑作仆役的形象,就可以阐明南海丝绸之路历代的贩奴(习称“昆仑奴”)活动至少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

^① 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附录一:关于岭南的重要旧籍》,《徐松石民族学文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209、210页。

借鉴体质人类学的鉴定成果,甚至是DNA分子人类学的研究成果,都可以为我们揭示岭南地区秦汉上古民族的源流提供有益的启示^①。

面对上述的“三重证据”材料,我们还必须借鉴多学科的方法和理论视角,才能进行广泛的综合研究,推进前人在相关领域的研究。

例如,对于揭示区域族群社会文明形态的多样性和特殊性,今天仍然属于学术热点的中国早期文明理论研究成果就十分值得借鉴。早在20世纪前期,顾颉刚先生就对重建中国古史的新体系提出过“四个打破”的新史观,分别是:①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观念;②打破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③打破古史人化的观念;④打破古代黄金世界的观念^②。的确,我们现今已有充分的资料来阐明泛北部湾地区是多族群共生的文明社会;它的社会结构也不是完全的大一统,而是多元一体地运行;英雄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但两者也是与自然共生演变的一元;以唯物史观看,岭南古族社会文明始终也都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螺旋式演进的过程。

再如,近十多年来学者热衷于讨论的中国国家起源发展的理论^③,也可以为我们探讨泛北部湾地区多族群共生的文明社会形态提供较多的视角。一般认为,狭义的“文明”,是与“国家”概念紧密联系的一对范畴。本区域的国家文明也不是骤然诞生的,先秦时期,在商周王朝文明的影响下,岭南地区也进入了青铜时代,并且形成了若干个百越族群的首邦方国,其后才在强大的秦汉王朝的军事统一下纳入了帝国的版图。但这一帝国在南疆的行政管理系统却是有层次变化的,也就是说,早期以氏族社会脱胎而来的首邦组织结构在秦汉时期的岭南一直都存在,它是在中央集权制的制约下调适和演化的。以血缘家族关系作为法统继承制的核心纽带,是中原与边区的共性,但无严格的嫡长继承制,这又是岭南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原的区别。

我们认为,国家文明的形态标准,仅是相对而言,所以本书的研究应当是以更多的实证去补充完善中国古代国家文明的结构体系。中央集权制下的边区羁縻制,能从很多方面去印证早期国家的体制。例如,商周王朝有所谓的“内服、外服”,中央王室是按地区的远近和民族关系的亲疏来处理内外事务,事实上,汉代南越国与汉王朝关系的演变就可以部分证明这一史实。又如,汉高帝对待南越赵佗,实质上是以陆贾为使,去疏通汉越关系,目的是保持汉朝南疆长沙国等地的安定,这表明汉初之汉越之间还不属于外服关系。但到了汉武帝武力征服岭南之前,南越王已遣子入京为质,并娶中原汉人为妻,表明汉与南越的关系已演变成外服关系,入质与和亲两种边区与中央王室的关系已得到体现。再如军制、法制等,在岭南地区也是随政治格局的演变而演变。另一方面,岭南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演变,又受到自然地理气候环境的制约,于

① 李辉:《百越遗传结构的一元二分迹象》,《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

② 顾颉刚:《答刘、胡二先生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③ 沈长云、张渭莲:《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与形成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

生产力不能在较大范围内实现平衡发展的前提下,其生产关系的演变也不完全与中原同步。

六、何谓“泛北部湾地区的秦汉古族社会文明”

它指的就是本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除了本书限定的空间和时间,事实上在学术界长期都存在着有关“文明”一词界定的争论,我们这里所指的“文明”,是特定历史时期(秦汉王朝)区域性的多民族共同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那么,这一区域性的古族社会文明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第一,泛北部湾地区的秦汉古族社会文明是中原王朝文明演进的次生形态。许多学者都指出,只有东亚南部的上古时代曾产生过真正的王朝文明,这在整个东南亚地区是独一无二的。其原因何在?这是本书必须要阐明的问题。我们认为,它首先是由地理环境决定的,也就是说,这一地区与东亚大陆有着天然的地缘政治联系。没有大陆文明的影响和延伸,就不会产生本区域上古时代的王朝文明。

第二,多元一体的泛北部湾地区秦汉古族社会文明呈螺旋式演进。中央集权制,有利于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但同时中央治边的政策及其代理人执行情况的变化,也会造成文明演变的进与退。如前所述,在“华夏中心论”偏见的影响下,2000多年以来的许多中原人都把岭南地区视为蛮荒之地,其上古社会又何来文明可言?这就是本书要着眼解开的谜团。我们要阐明的是,泛北部湾地区曾有过无可取代的辉煌,也有过文明衰退的时期,中央专制集权下的种种不可克服的弊端和不同族群的文化冲突及调适的不当,是引起文明社会倒退的根本原因,归根到底,泛北部湾地区秦汉社会文明同样是中国封建王朝文明周而复始循环演变的一个缩影。

第三,泛北部湾地区上古文明是秦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秦汉王朝内外交通的重要门户。秦汉文明的伟大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取决于它在地区范围内影响力的深远度,这都依靠王朝自身开疆拓土和扩大内地与边区、扩大东方与西方世界的交流来加以实现。就此意义来说,泛北部湾地区的区域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回答,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出现过的几度文明发展的高峰中,本区域的社会运行究竟起到过什么样的作用。

第四,文明的相对性是一个不能回避的地区现实。按文化相对论的观点,民族文化的生成,只是人对自然的适应,并无进或退可言,这令笔者难以认同,但通过野蛮的征服去实现、完成社会的进步,却又是无法抹杀的事实。本区域社会文明发展的历程是曲折的,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其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及民族矛盾交织,冲突不断,但历史的车轮最终还是滚滚向前,我们需要揭示的是,经数个世纪社会的跌宕起伏,为何直至三国魏晋时期,泛北部湾地区仍然是中国古代文明大厦中不可动摇的基石。

七、研究历史的简要回顾

我们必须指出,虽然目前仍然缺乏本区域的上古族群社会文明史专著,但前人在诸多领域进行的文明史专题研究,已为本书研究任务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之作一简要的回顾。

属于近现代意义的泛北部湾地区秦汉时代的古族社会文明研究,迄今已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通史类的代表性著作

例如,J. 谢诺的《越南史》(巴黎,1955年);黎圣魁的《越南文明史》(巴黎,1955年);A. 伍德希德的《越南与中国模式》(剑桥,马萨诸塞,1971年)^①;〔日〕石井米雄等著《印度支那文明的世界》(东京,讲谈社,1985年);〔法〕G. 赛代斯的《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商务印书馆,2008年);〔新西兰〕N. 塔林主编的《剑桥东南亚史》(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贺圣达的《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越〕陶维英的《越南古代史》(商务印书馆,1976年);郭振铎、张笑梅主编的《越南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等。

事实上,早在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都一直比较关注中国南疆与越南的古代史和民族史研究。例如,百越民族史研究的先驱徐松石先生,在他1938年出版的名著《粤江流域人民史》等著述中,都或多或少地论及越南的古史、古代文物和民族源流问题,其中也涉及安南的铜鼓。更为难能可贵的是,该书力图将出土文物结合民族史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奠定了后来东亚南部民族铜鼓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徐松石先生在文中使用的地名考证、历史语言比较诸方法至今仍然为后人称道师法^②。又如,陈修和先生在1943年就写成的《越南古史及其民族文化之研究》一书,由云南大学西南文化研究室印行。其后继者较突出的则有尤中的《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陈国强等著的《百越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马大正主编的《中国边疆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方铁主编的《西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等。

毫无疑问,上述的代表性著作都可在不同程度上为后来学者的研究提供较丰富的基础知识、方法和理论的借鉴,其中许多创新性的观点至今仍然为不易之论。特别是本书研究涉及的东南亚地区诸问题,〔新西兰〕N. 塔林主编的《剑桥东南亚史》仍然

① 〔新西兰〕N. 塔林主编,贺圣达等译:《剑桥东南亚史》(I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48、224、225页。

② 《壮学丛书》编委会:《徐松石民族学文集》(上、下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是目前最有参考价值的著作之一，其中每章末都有相关参考文献的简介，极便于读者检索利用。然而，我们也需要指出，该书关于越南北属时期的上古文明史描述仍然是贫乏的，其突出的缺陷是没有广泛吸收越南北方、中国和日本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考古资料引述也不多。

我们还需要指出，由于时过境迁，上述著作作为专门的区域性通史，其内容叙述与文化阐释已经存在较大的填补空间，其中观点也不免存在需修正之处。例如，法国学者G. 赛代斯曾认为，印度文化的东传，在很大程度上是商业活动和航海者不断聚汇的结果。在东南亚的许多地方，印度化最古老的证据都是提洹羯佛佛像，这种佛像颇受常到南方诸岛去的航海者们的尊崇，但是在外印度组成的王国，它们很快是采用印度湿婆教的王权观念，表现为对国王林伽的崇拜^①。这一分析论证的确是得到了考古发现的证实，如近年云南昆明羊甫头西汉早期滇族墓就出土了较多的林伽崇拜物，不过后者也同时证明，印度文化因素向东亚南部传播，当不会像G. 赛代斯所说的是在东汉初期，昆明羊甫头的发现，当可将此年限提前到西汉早期^②。

（二）有关本区域文明史的专题论著

这类的国内外著述也很多，难以一一列举，如近20多年来出版的论文集和专著，就有潘琦主编的《广西环北部湾文化研究》《西江文化研究》（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2002年）等；张荣芳的《秦汉史与岭南文化论稿》（中华书局，2005年）；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等编的《南越国史迹研讨会论文选集》；蒙文通的《越史丛考》（人民出版社，1983年）；梁志明等著的《古代东南亚历史与文化研究》（昆仑出版社，2006年）；余天炽等著的《古南越国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孙机的《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等。

此外，法国汉学家的早期研究仍有其价值，如马司帛乐（H. Maspero）的《文郎国》《马援的远征》（1918年）；鄂卢梭（Aurousseau）的《公元前三世纪中国初次征服安南》（1924年）等。法属越南时期的越南上古史研究，多刊载于《法国远东博古学院集刊》上，其中一些重要的论著也曾被翻译成中文。

长期以来，日本是最为关注中国南疆与东南亚研究的国家，日本京都大学很早就设立了东南亚研究中心，迄今为止日本学界已积累了较丰硕的相关研究成果。例如，〔日〕酒井良树的《越南的文化》（筑摩书房，1969年）；石田干之助的《有关南海的中国史料》（日本，生活社，1945年）；今村启尔的《东南亚国家的形成》（日本《季刊考古学》第66号，1999年）；后藤均平的《二世纪的越南》（日本《史苑》第31卷第2号，1971年）；吉开将人的《作为世界历史的岭南、越南北部》（日本《东南

① 〔法〕G. 赛代斯著，蔡华、杨保筠译：《东南亚的印度化国家》，商务印书馆，2008年，48页。

② 谢崇安：《滇桂地区与越南北部上古青铜文化及其族群研究》，民族出版社，2010年，558页。